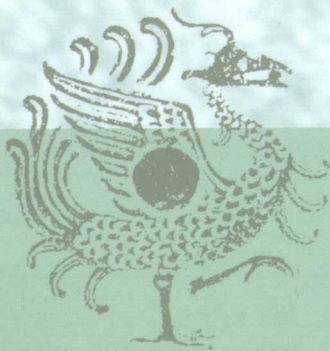


先秦至魏晋时期 方所介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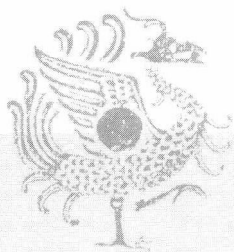
史冬青 著



齊魯書社

先秦至魏晋时期 方所介词研究

史冬青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研究/史冬青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4

ISBN 978 - 7 - 5333 - 2193 - 2

I . 先... II . 史... III . 汉语—介词—研究—先秦时代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024 号

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研究

史冬青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193 - 2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概貌	(15)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方所介词	(15)
一 表示动作行为的所从	(16)
二 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	(23)
三 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到	(29)
四 表示方向	(41)
五 表示沿途	(44)
第二节 两汉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方所介词	(47)
一 介词“著”	(47)
二 介词“向”	(48)
三 介词“就”	(49)
四 介词“即”	(50)
五 介词“临”	(51)

六 介词“顺”	(52)
七 介词“缘”	(52)
八 介词“沿”	(53)
九 介词“寻”	(53)
十 介词“到”	(54)
十一 介词“经”	(55)
十二 介词“往”	(55)

第二章 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专题研究

(57)

第一节 先秦时期方所介词的个案分析

(57)

一 介词“于”	(57)
二 介词“从”	(78)
三 介词“在”	(95)
四 介词“由”	(110)
五 介词“自”	(123)
六 介词“以”	(150)
七 介词“乎”	(177)

第二节 两汉、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个案分析

(190)

一 介词“著”的形成及演变	(190)
二 介词“向”的形成	(200)
三 介词“就”的形成	(206)
四 介词“即”的形成	(211)
五 介词“临”的形成	(214)

六	介词“顺”的形成	(217)
七	介词“缘”的形成	(220)
八	介词“沿”的形成	(223)
九	介词“寻”的形成	(224)
第三章 方所范畴与时间范畴的关系		(226)
第一节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主要时间介词的		
	功能考察	(226)
一	表示动作行为在某一时间进行	(226)
二	表示动作行为从某一时间起开始	(241)
三	表示动作行为终到的时间	(248)
四	介词“于”、“在”、“自”、“及”的方所用法和时间 用法的对比分析	(256)
第二节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时间介词的特点		(261)
一	语义类型	(261)
二	时间介词的宾语	(263)
三	时间介词短语的位置	(268)
第三节 “空间—时点、时段”转移中的因素		(268)
第四节 与介词“自”、“从”有关的时间副词化问题		(273)
一	与“从来”、“自来”相关的时间短语	(273)
二	“从来”与“自来”的形成:短语省缩词化	(275)
第四章 结语		(278)
第一节 方所介词的使用情况及其历史演变		
		(278)

第二节 动词介词化的因素	(280)
一 句法位置的改变	(280)
二 语境影响	(286)
三 认知因素	(288)
第三节 介词的空间范畴向时间范畴转移的机制	(291)
第四节 方所介词的进一步语法化:由介词到 词内成分	(294)
主要语料文献	(302)
参考文献	(304)
后 记	(314)

绪 论

由于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特殊的语法功能,介词历来是语法学家们关注的对象。自《马氏文通》以来,有关介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进,某些原来存有争议的问题现在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介词的描写与解释方面,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不少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以往普遍认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语言理论体系不是重要的,语言演变的事实才是重要的。而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我们愈发感觉到,理论体系才是汉语史研究的指针,好的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语言演变事实,并有助于对其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现代汉语介词研究的进展最快,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而古代汉语介词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因此本书选取了方所介词作为研究对象,以先秦至魏晋时期的16部文献为主要调查语料,对这一时期的方所介词进行历时考察,不仅对它们的发展演变及使用情况做深入细致地分析与描写,也尝试着对相关介词的来源、形成进行探讨和解释,以期能够摸索出汉语介词系统发展变化的某些规律。

一、研究对象和依据的文献语料

介词的初始义多为空间义,从空间义可广泛延伸到其他抽象域中。如古代汉语的介词“于”可以表示地点、时间、对象、范围、方

式、原因等,仅“对象”类而言,它又可以引进“涉及者、接收者、所对者、言谈者、施事者、求索者、比较者、受事者”。“于”构成的介词结构,其核心用法是表示方所,其他的用法都同这一核心用法有关联。由“于”介引的表“所在”、“由来”、“归趋”的方所最初都是具体的,根据动词与介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分别译为“在”、“从”、“到”。如:

(1)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左传·庄公八年》175页)

(2)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左传·庄公八年》175页)

(3)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诗经·小雅·伐木》)

从所在的方所进一步虚化可指所在的方面。如:

(4)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左传·昭公十三年》1350页)

(5)燕……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史记·燕召公世家》1562页)

从由来的方所进一步虚化可指所由的原因。如:

(6)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1458页)

(7)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制也。(《国语·周语》70页)

从由来义也可引申表受动,即引出动作所由的施动者。如:

(8)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经·邶风·柏舟》)

(9)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左传·成公二年》791页)

由归趋义可进一步虚化为动作所对或求索的对象。如:

(10)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170页)

(11)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战国策·齐策》316页)

由归趋义还可进一步虚化为比较的对象。如：

(12)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146 页)

(1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汉书·司马迁传》2732 页)

有着类似虚化过程的还有魏晋时期新兴的方所介词“缘”。“缘”本义指“衣缘”,引申为动词义“沿着”,演变作介词,引进动作经过的路线。如：

(1)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桃花源记》)

由沿途义进一步虚化可指根据的事物。如：

(2)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吕氏春秋·察传》1526 页)

又可引进行为产生的原因。如：

(3)赵穿缘民众不悦,起弑灵公。((《公羊传·宣公六年》)

在由“缘”构成的介词结构中,表方所的用法仍是其核心用法。

从介词“于”、“缘”的虚化过程来看,实词虚化是有层次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实到较虚再到最虚逐步发展的;另外实词虚化的层次性还表现在虚化的方式上,一般是由某一词汇意义演化出一语法意义,由这语法意义再进一步演化出新的语法意义,如此环环相扣,朝着同一方向转化。而介词中这个“较虚”、“最初的语法意义”通常表现为方所义,抓住这一核心义,也就抓住了多功能介词意义之间联系的线索。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把方所介词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根据由杨伯峻和何乐士主编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马贝加的《近代汉语介词》两部语法专著选取了 21 个有代表性的方所介词,通过描写它们的语法化过程,来了解方所义在介词语义范畴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和其他语义范畴的关系;同样我们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表示时间背景的介词,通过描写它们的时间用法,来进一步阐释介

词的方所范畴和时间范畴之间的关系,从中探讨语法化的条件和因素,以期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介词的发展历史,更科学地分析介词的现状。

本书把《史记》、《论衡》、《三国志》、《世说新语》作为两汉、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研究依据。《史记》1~7册有相当一部分汉以前的内容,语言难免受前代文献影响。9~10册除人物列传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其他内容,如“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货殖”等列传,内容不同,记叙的文体和语言风格也难免有异。第8册绝大部分是汉代达官名人的传记,内容、文体、语言风格都较一致,且记叙人物故事,生动活泼,对话也多,较能反映汉代语言风貌特点。^①《论衡》虽是东汉时的政论文章,但用语浅易,作者在书中主张“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表明自己作书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②,材料的通俗性使我们的研究更有价值。《三国志》是汉末魏晋时期的重要语料,与先秦的上古汉语和宋元以后的近代汉语有着显著差异。《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期间(公元5世纪),汉语史学者大都有这样的共识,即认为从东汉(公元1世纪初)至隋末(公元7世纪初)为中古汉语时期。^③那么,《世说新语》成书的时代刚好属于典型的中古汉语时期。同时《世说新语》反映的主要是魏晋人物的言行逸事,多当时口语实录,非常接近魏晋时代语言的真实面貌,正如王力先生所云:“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在这时期中,只

① 何乐士:《〈左传〉、〈史记〉介宾短语位置的比较》,载《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语出《论衡·自纪》。

③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少数散文作品是接近口语的。”^① 所以在口语化及反映时代语言的典型性方面,《世说新语》有其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这四部文献作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可是单从这一个阶段来看,方所介词的历时变化不明显,势必要有个比较的对象,为此我们又选取了先秦的《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礼记》、《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荀子》、《庄子》、《韩非子》12部文献。先秦的语言与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差别很大,两汉又处于这两个时期的过渡阶段,如将前后贯穿起来,足以看出语言变化的痕迹,方所介词的发展演变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当然应阐述问题的需要,我们还会参考其他的相关语料,如《汉书》、东汉佛经、求那跋陀罗汉译佛经、《搜神记》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相关介词的国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从现有的材料看,汉语的介词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了。^② 但是,真正把介词作为语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类来进行研究,才不过一百年的时间。从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发表到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处于对介词系统的构建、介词体系的认识及初步统一时期:章士钊(1907)、来裕恂(1920)、刘复(1920)、金兆梓(1921)、陈承泽(1922)、杨树达(1923)、黎锦熙(1924)、傅懋勳(1942)、吕叔湘(1942)、廖庶谦(1946)、高名凯(1948)、张志公(1952~1953)、刘世儒(1952)、吕冀平(1954)、曹伯韩(1957)到王力(1958)、朱德熙(1979),他们基本上是围绕着汉语介词的定义、范围、体系、语法地位、与其他词类之间的界限以及介词的归属等问题展开讨论。当然这一时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

②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42页。

期在介词的研究领域上也有一定的开拓,像黎锦熙、刘世儒(1957)开始通过大量的材料,帮助人们认识介词、解决介词问题,但也仅是分析了“特用介词”(“得”、“地”、“的”)的语法特征;李临定、范方莲(1960)主张介词的分析应从语言材料出发,强调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原则。80年代,关于介词的描写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代汉语八百词》(1981)、《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是两部代表性的著作,书中对各词描写之细,是空前的。这一时期对一些由介词构成的句式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把”字句、“被”字句、“使”字句,还有“从……到……”、“对”字句、“在”字句等等,这种对句式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像介词这样的虚词的意义、作用和特征提供了一种方法,即只有把它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能更好地认识它。

作为通论性著作,仅作共时的描写无可厚非,但要想深入研究,就必须进行断代性的、专题性的考察分析,必须有历史发展的眼光。王力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表示,古汉语语法研究不能以构建完整的语法体系为目标,而以对历史语法的某些现象进行描写为主。他非常重视古今语法之间的联系和演变,在《汉语史稿》(1958)中讲了包括介词在内的九类词的发展演变。而在此之前,汉语语法的研究多是共时的静态描写,很少是从历时动态角度来研究,更没有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研究汉语语法发展规律的,所以他在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介词的多角度、全方位探讨使得介词的共时研究、历时研究都呈现出了崭新的局面。郭锡良的《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和《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1998)在方法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主要典籍中“于”、“以”的用例进行了详尽的数量统计分析,对“于”、“以”语法功能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起源于动词到丰富表达功能的逐渐形

作作了细致地描写。文章还对某些著作训诂学方法训释虚词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要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把每个虚词都摆在一定时期的语言系统中去考察,一个虚词的各个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自身形成一个系统,不要孤立地看问题,随文释义,把一个虚词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强给它设立一些非固有的义项”^①。这一批评振聋发聩,很有现实意义。

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中有关介词研究的著作有: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2002),张赓《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2002),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1989),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向熹《简明汉语史》(下编)(1993),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2000),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2004)、《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2004),等等。另外还有作专书介词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详见“参考文献”)。

这一时期有关介词研究的单篇论文有:石毓智《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1995),马贝加《介词“照”的产生》(1992)、《方式介词“凭、据、随”的产生》(1992)、《介词“沿”的产生》(1992)、《介词“同”的产生》(1993)、《介词“缘”的产生及其意义》(1996)、《介词“就”的产生及其意义》(1997)、《介词“经”的产生及其意义》(1999)、《介词“向”的产生与发展》、《对象介词“将”的产生》(2001),等等。

纵观汉语介词的研究,学界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对介词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有关方所介词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研究者或是将它视作介词中的一个类别来描述,或是仅针对某个方所介词进行个案分析,所以现有的讨论还比

① 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载《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较零散,研究力度浅略不够深入,没能对语料进行穷尽性统计,并且溯源探流工作做得还很不充分,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借鉴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的前沿理论,采用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去探寻汉语介词演变的过程及规律。

三、研究的方法

相对而言,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对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的进展关注较少,在具体的研究中,理论思考也比较欠缺,因而对汉语语法演变规律的探求也还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务必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广泛地采纳多种研究方法来面对不同性质的汉语语法事实,在继续注重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注重理论,寻求解释。

(一)共时描写与历时分析相结合

本书首先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进行全面的描写,根据产生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先秦时期的方所介词和两汉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方所介词两大类。在第一类中按其语法功能的不同又细分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所从”、“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到”、“表示方向”和“表示沿途”五类进行描写,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方所介词的发展概貌。当然为了展示每类语义下介词的历时演变过程,我们都会涉及它们在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随着方所语义角色的逐步抽象化,我们所讨论的方所范畴也由具体方所转向认识方所(能够被人类思考的认识空间)、人文方所(人类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的生存空间)、逻辑方所(能够提供描述其他空间工具的逻辑空间)等等;对于后面个案分析中没有涉及的介词,我们会尽量溯其来源,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梳理其语法化过程,力图展示其清晰的演变脉络。由于介词功能

的逐步单一化,在第二大类中我们就不再细分语义类型。在这一类中我们会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描写它跟相关成分的关系,将最初的动词义素与变化后的义素作一比较,根据其义素的消长、扩缩等情况来确认这个词的介词性质。

本书在共时平面描写的基础上,又对这一时期主要的、使用频率较高的介词作专题性的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展开调查。

如考察魏晋时期方所介词“就”的形成及演变。首先就语料中的“就”进行穷尽式统计,归纳出“就”所处的四种句式:①V1+就+N;②V1+而+就+N;③就+N+而+V2;④就+N1+V2(+N2),由“而”连接的连动式中的“就”不可能直接演变为介词,所以②③式中的动词“就”不予考虑。通过剖析符合①式的用例,发现V1多数为运行动词,如“出”、“趋”、“归”、“步”、“移”、“入”、“近”、“退”等,随着“就”在这种句法结构中的频繁出现,句子的语义重心逐渐落到V1上,“就”的“往……去”表示运行的功能逐渐由前面的运行动词来承担,“就”慢慢失去表示运行的义素,虚化为表示动作终到点的介词,相当于“到”。然后通过纵向对比分析,发现①式中的“就”要比④式中的“就”虚化进程早得多,先秦时期“就”表示动作终到点的功能已初露端倪。“就”是先获得表终到点的功能,继而获得表示所在处的功能的。

本书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样不仅便于了解它们演变的脉络和虚化的规律,进而可以掌握这些介词在整个汉语语法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

(二) 比较

“比较”,也叫“比较语法”,西方语言学理论之一,指把有关各语言或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各个不同阶段间的语音、语法和词

汇对应关系加以比较。^① 其实在我们所分析的每个动词的介词化过程中已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如通过探讨某个动词在先秦、两汉及魏晋时期与其周边成分的关系:动词的论元结构、动词的词汇语义特征、动词与体词性成分的关系等等,进而就把握了介词衍生的规律:处于句子结构中核心句法位置的某个动词由于经常出现在起补充、修饰作用的句法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的抽象化,发展下去,便虚化为介词。像前面谈到的动词“就”的虚化过程,它是先获得表终到点的功能,继而才获得了表示所在处的功能的,这一结论也是通过分析“V1 + 就 + N”和“就 + N1 + V2(+ N2)”两种句式“就”与其周边成分的关系,然后比较各自所处的句法位置复现频率的高低而得出的。

通过比较介词“就”和“即”的语法化过程,我们还发现词义的演变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影响和带动的。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相类似的线路引申。^② 在动词的介词化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原来词义相近的两个动词,其中的一个动词介词化后,另一个动词由于词义间的相互影响,也会沿着相似的路线发生演变,虚化为介词,我们称之为同步虚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步,只是指这些动词间的虚化轨迹大致平行,并非指这些不同的动词之间的虚化时间完全相同。“遵”、“循”、“沿”、“缘”、“寻”等表沿途义的几个介词有着近似的虚化过程。这些介词虚化的规律正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得出的。

(三) 穷尽式调查与举例分析相结合

目前大家对介词的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现代汉语介词

^① 冯春田、梁苑、杨淑敏:《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② 许嘉璐:《论同步引申》,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